

世纪初俄国汉学三杰

□ 李明滨

当前,学术界的“世纪回眸”热潮令人兴奋。百年来各个领域的著名学人和杰出成果让人重新提起,不但重见他们昔日的辉煌,而且可以享用他们辛勤耕耘后收获的果实。这不由得使人想起了国外汉学家的功绩。

过去,由于介绍得不够,国内对于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成就未能充分地了解。例如对于俄国,有时甚至还发生误解。有一位老作家的话颇具代表性,他说:“50年代与苏联文学交流不可谓不多,但这种交流实际上也是不平等的。我们几乎把所有苏联知名的作家作品都翻译介绍过来,甚至连一些二流、三流的作品也不例外,但苏联却没有翻译介绍多少中国的作家作品。”^①这里要说中国与苏联的文学交流存在着“译进来”的多,“介绍出去”的少,还有点根据的话,那么,说苏联没有译介

^① 李国文:《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守护神”》,载北京大学《国外文学》,2000年第1期,第25页。

多少中国文学作品就未必准确了。但是,这种误解的责任不在于作家,而在于研究国外学术动态的人。后者应该多做沟通信息、介绍情况的工作,好让国人明了国外的新情况。

实际上,恰恰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苏联汉学进入了辉煌时期。其所译介的中国文学作品,上自《诗经》,下迄当代文学,代表作品均已涉及。诗词、章回小说、戏曲诸方面的古典名著,现代、当代主要作家的选本几乎都有俄译,业已形成“中国文学文库”,凡40种(有的一种含多卷本选集)。

与此相适应,苏联从事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的领域,也成长出一批名家。他们大体同时在20世纪50~60年代步入成熟期,取得丰硕的成果。有三位汉学家可作为实例,2000年在北京、莫斯科和彼得堡分别为他们隆重举行了“诞辰百周年纪念”。这三位学者就是翻译和研究章回小说的罗高寿、研究汉语的龙果夫和编纂汉俄大辞典的鄂山荫。他们不但闻名于苏联,而且在国际汉学界也享有声誉。三人恰好同于1900年出生,我想,可以称之为“世纪初俄国汉学三杰”。

现以他们诞生的日期先后为序,依次叙写如下:

一、罗高寿与中国小说翻译

(一)章回小说的翻译与研究

《西游记》的俄译者为著名汉学家阿历克赛·罗高寿(A. Rogachev, 1900~1981),系俄国现任驻华大使、汉学家伊戈尔·罗高寿(Igor Rogachev)之父。为了区别,我们不妨称前者为老罗高寿。

老罗高寿的主要成就在翻译和教学,尤其是翻译古典名著《水浒》(1955年)和《西游记》(1959年)为他带来了很高的声誉。他自从1928年于莫斯科东方学院毕业之后,曾三次来华进

修或在苏联驻华的机构工作,前后居留中国 13 年。随后又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学院、莫斯科大学任教,直至 1981 年 4 月去世,教学生涯长达 41 年。他长期担任汉语语言文学教授、东方语言教研室主任等职,培养了大批汉学人才。

尽管他的中国语言文化素养很高,又经过长时间的准备,但在翻译小说时还是遇到了不少困难。章回小说这种体裁本来对于俄国人来说是很不习惯的。在他们看来,诗必须是有韵的,而小说则是无韵的散文,二者不可混用。章回小说把它们糅在一起,叙事中不断地出现“有诗为证”,似乎显得不伦不类。对于汉学家来说,翻译古典诗词更加困难。何况《西游记》中有天、地、人三界和大量的人名、地名以及各路神仙、妖魔鬼怪,其译介的难度可想而知。译者只好用翻译加详注的办法。即便如此,翻译工作也得旷日持久地延长下去。为了加快进度,他不得不请另一位老汉学家,当年曾以协助瞿秋白率先采访报导新俄社会而闻名的(符谢沃洛法)郭质生(V. Kolokolov)来完成第三、四卷,他自己则翻译第一、二卷,并为小说写出长篇序文和详细注释。

小说出版以后,他又年复一年、锲而不舍地长期坚持研究工作,终于在晚年完成了一部 117 页的论著《吴承恩及其〈西游记〉》,于 1984 年出版。这是俄国论析章回小说的著作中颇具特色的一部。尤以在评论艺术特点方面很有见地。

作者分析《西游记》的结构有三层。一是叙事,即叙写唐三藏到西天取经,经历的一个个惊险离奇、艰难曲折和饶有兴味的故事;二是说理,说明唐僧师徒四人遭遇到八十一难的缘由;三是作神秘主义的解说,交代整个西游取经故事和其中当事人的命运的总根源,给予神秘主义的宿命论的解释。

他认为,检阅主人公的历险和遭遇劫难的每一个故事,就可以概括出“障碍—克服”这样的一个模式。每个故事情节都是按这个模式安排的。不过,吴承恩以他娴熟的写作技巧,巧作安排,

使得它曲折多样、变化万千,以致引人入胜罢了。老罗高寿用分析欧洲小说常用的方法来考察《西游记》,非常新颖。

此外,他也按分析世界文学习用的类型来看待这部小说,认为《西游记》属于“长篇小说—史诗”类型,说它兼具两者的特点。

多亏有了译者的翻译和评介,小说《西游记》得以在苏联长期流行,广受欢迎。到1982年又有莫斯科大学教授、老汉学家(德米特里)华克生根据罗译本加以摘选,出版一本《西游记》的节略本,书名为《猴王孙悟空》,并且移用了老罗高寿为四卷全译本所写的长篇序文。这样做就更加大了小说在俄国传播的力度。

(二)令人敬仰的汉学世家

老罗高寿出生于东哈萨克斯坦州的一个山村。他对中国不但十分熟悉,而且怀有亲密的感情。他毕生研究中国,发表论著四十余种,副博士学位论文就是依据孙中山和毛泽东的著作作为资料写成的《借固定词组表现的汉语成语》(1950年)。他身上深刻的中国情结直至表现在子女的培养上。儿子伊戈尔是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副博士,长期在外交部门工作至出任大使,知名度也很高。女儿加林娜同样为汉学家、历史学副博士,在俄国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工作。罗高寿一家在俄国是受人尊敬的汉学世家。

伊戈尔·罗高寿即小罗高寿出生于1932年,1950年考入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学习汉语。从学生时代起,小罗高寿就时常参加接待中国访苏人士的活动,充任翻译,培养了对中国的感情。据他说,给他印象和影响最深的,是经常陪同访问团出席中国驻苏大使馆戈宝权临时代办所举行的招待会,那时他就为戈宝权先生“出色的翻译、博学多识以及精深的俄语知识和中国诗歌的知识所折服”。

1955年毕业后,他“子承父业”,也立即开始从事对华有关的外事工作,并且在早期曾两度来苏联驻华使馆任职(1958~1961年和1969~1972年)。后来在担任了一段时间的苏联外交部副

部长之后,又于90年代初出任俄国驻华大使。他前后在中国居留逾15年,对中国国情有了广泛和深入的了解。

小罗高寿“子承父业”还表现在另一方面,即在外交工作之余,又重视相关的学术活动,注意撰写学术文章,有的论文颇有分量,如《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1977年)、《美帝国主义对越南的侵略》(1986年)、《苏联的和平政策与亚太区域的合作》(1988年)等。这一切均使得他给人以学者型的外交官印象,况且他早在1965年就通过论文答辩获得副博士学位。

女儿加林娜·斯杰潘诺娃(Galina Stipanova,系成年后从夫姓)则连出生地也在中国,即于1933年出生在老罗高寿任职的驻华领事馆所在地新疆塔城。她曾就读于莫斯科大学经济系,也学了汉语。1957年毕业后即在苏联政府的有关部门从事对华联系和交流的工作,直至1971年调入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从事学术研究。先后发表论著五十多种,并于1978年获副博士学位。

加林娜的研究重点在中国的政治体制,其代表性的论文有《中共发展过程中的若干倾向》(1962年)、《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的形成及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体制中的作用》(1978年)、《论中国的统一战线》(1984年)和《政党与统一战线》(1988年)等。

罗高寿一家两代人所从事的工作,都直接促进了中俄两国的交往。他们本身也致力于充当两国人民交流和友谊的桥梁,尤其在宣传中国文化、增进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方面作出了贡献。老罗高寿为了让苏联读者及时熟悉新中国,在刚解放不久,就于1951年翻译出版了马烽、西戎著的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与斯佩兰斯基合译)。他当时的着眼点与其说是小说翻译,不如说是对中国大变迁之中新人新貌的介绍,让读者通过小说形象地了解中国社会。

二、龙果夫与汉语研究

俄国汉学家龙果夫(Alexandr Dragunov, 1900 ~ 1955)之所以为中国学界所知,并非因为他取了个仿汉语习惯的名字,而是由于他在汉语研究中有新发现和新见解。

(一)发现汉语的第六方言

其实,他原名的姓音译应为“德拉古诺夫”。但在俄文里其读音与“德拉贡”(意为“龙”)或“德拉古恩”(意为“龙骑兵”)相近,二者均与“龙”有关,所以便自名“龙果夫”。这对于中国人来说自然是易懂好记,也备感亲切,是故人们见面总乐于直呼他为“龙同志”或“龙老师”。这种称呼还堂而皇之地进入过正式文件,1931年8月在海参崴举行的“第一次拉丁化中国字代表大会”的决议案,一开头就这样写着:“听了龙同志关于拉丁字化中国字母”的报告,云云。

龙果夫出生于彼得堡一官吏家庭,1925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社会科学系民族与语言科。他先后在苏联托尔马切夫军事学院、列宁格勒大学和海参崴远东大学等校执教11年,在此期间在汉字拉丁化委员会兼职。他曾协同瞿秋白在推行汉字拉丁化上做了许多工作,包括拟定拉丁化方案、组织人力付诸实行和推广等,后来进了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专事语言研究。

他很早就显示出对语言的敏感性和研究才能。青年时代发现新方言的故事至今仍传为美谈。20世纪30年代初他在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院教中国留学生俄语的时候,就注意从那些中国学生的口中搜集语言资料,以进行汉语方言研究。那时有大批中国热血青年在北伐战争和大革命失败后纷纷避难苏联,人数多而且来自许多地方。龙果夫明智地充分利用了这种特殊的条件。过去一般认为中国有吴语、闽语、粤语、赣语、客家语等五大方言

体系,可是他在调查中发现,有两位来自湖南省湘潭县湘乡的学生讲的方言很特别,他闻所未闻。于是他用录音整理的方法记录下来作分析,反复对比研究,发觉它不属于五大方言之内,随即发表文章阐明新的记录,引起很大反响。

限于当年的条件,龙果夫不可能亲身来华,于是由苏联科学院通过适当的途径到当地验证,结果证实了他的发现。从此传开了他没到过湖南却发现了“湘语”方言的故事,犹如从前在俄国流传的发现北冰洋的故事一样。据说先有科学家根据报纸报导冰的流向信息,推测有北冰洋存在,而后才由北极探险队加以证实。此二事被传为美谈:“科家家看报纸发现了北冰洋,龙果夫在家里发现了中国的第六方言。”

龙果夫的科学发现并不是出于一时的灵感,而是来自深厚的民族知识和语言功底。同样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他另一篇学术论文早已激起波澜。1930 年他在欧洲的汉学年刊《通报》(*T'ung Pao*)发表长文《方块字文献和古代官话》。文中对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 1883 ~ 1945)以前所作的中古汉语构拟,做出了重要修正。《通报》由荷兰莱顿大学和法国巴黎法兰西学院于 1890 年联合创办,历史悠久,影响广泛,为国际上最具权威的汉学刊物;况且龙果夫修正的对象又是马伯乐这样闻名遐迩的国际汉学名家,这不能不引起世界汉学界的刮目相看。由此起步,龙果夫在学术上突飞猛进,不久就未经答辩而直接获得语文学副博士学位(1937 年)。

龙果夫主要研究领域为汉语和东干语,涉及其中的各个方面,共有著述近五十种,例如论文《汉字拉丁化问题》(1932 年)、《东干语》(1937 年)、《汉语词类》(1937 年)、《古藏语音系特点》(1939 年)、《东干语语法研究,一、东干的语的体和时态范畴(甘肃方言)》(1940 年)、《现代汉语普通句的分类问题》(1957 年)等,在两个领域的成就均得到后人的推崇。东干语语言学学者、

吉尔吉斯族汉学家卡立莫夫(Kalimov Abdurahman, 1923 ~)等称他为“东干语语言学科的奠基人”。而《现代汉语口语语法系统》(1962年)一书还是油印讲义的时候,就于60年代初由其曾到北大中文系进修的门生雅洪托夫(S. Yahontov)带来使用并引起中国人的注意。

(二)王力、吕叔湘教授的高度评价

对于一个研究外国文化的人来说,能够得到研究对象国的承认,是莫大的荣幸。而要是能得到对象国同行专家甚至是学科权威的赞扬,自然是更大的光荣。

龙果夫的现代汉语研究成果恰恰得到了中国语言学界著名学者王力、吕叔湘等的赞誉,并留下了一段他与王力教授文字之交的佳话。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王了一(王力)所著《汉语语法纲要》一书就被引进苏联并译成俄文,作为汉学专业大学生用书,而为该书俄译本(1954年正式出版)作序并加了详注的人恰好是龙果夫。序文盛赞王著的权威性,由此王力先生的著作得以在苏联流传。后来在50年代中期,当龙果夫写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1952年)一书时,反过来立即得到王力等中国名家的肯定,先是被逐章翻译过来,分期在《中国语文》杂志上发表,刊出了全书的三分之二后,又在1958年出版全书(科学出版社)。中译者满怀深情和敬意地谈到龙果夫:“译稿最初刊出的时候,著者很高兴,可惜不久他就去世了。现在全书将要出版,可是著者看不见了,译文也无法获得他本人的校订,实在是非常遗憾的事。在最后整理全稿的时候,我们收到龙果夫夫人寄来的订正本,是苏联科学院准备印行龙氏选集用的,我们也就依照了这个本子订正了译文。”表达这层意思的人之中就有王力,原来该译本系由郑祖庆初译,王力、吕叔湘、邵荣芬、范继淹分工逐章校改译文,吕叔湘撰写按语。从这个译者的阵容可以看出该书是多么受中国学界的重

视。

译者在中译本的序文中对该书作出高度的评价：“龙果夫教授这本《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是他多年研究和教学汉语的成果。这本书有好些优点。著者对语法有比较开明的看法，不肯把西方的语法体系强加在汉语上；他的观察相当敏锐，注意到许多被别的作者忽略了的现象；他重视语法的系统性，善于把问题提到理论的平面上来讨论。对于研究汉语语法的人，这本书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正是由于权威学者的评介，这本书才更快地引起重视，而且长期流传，至今仍受到该专业研究生的参考和借鉴。它不但在汉语语法研究学术史上占有历史地位，而且在当前也具有现实意义。它并使得龙果夫与王力的那段文字姻缘更显出光彩。

（三）对汉语语法的独到见解

龙果夫的主要成就还在于现代汉语语法理论研究上，他对现代汉语语法的特点有独到的见解，“不肯把西方的语法体系强加在汉语上”。

自从有了《马氏文通》开始采用西洋语法来分析汉语的语言事实以后，汉语语法研究展开了新的局面，马建忠的贡献是人所共知的。不过在实现了开拓意义之后，此法行之日久也带来了另一种倾向，即让汉语的语言事实迁就西洋语法的格局，无视汉语自身的特点。朱德熙先生批评这一倾向是“印欧语语法观念给汉语研究带来的消极影响”，即“用印欧语的眼光来看待汉语，把印欧语所有而为汉语所无的东西强加给汉语。”^①

可是龙果夫不是这样做的。他在50年代几乎与中国学者同时看出了这种倾向的弊端，并且著论力避这种偏颇，他属于能跳出这种框框的少数外国学者之一。诚如北京大学的汉语教学和

^① 朱德熙：《语法答问·日译本序》，1984年。

研究者胡双宝教授所作的概括：“跟中国人以印欧语法为蓝本研究汉语相比，倒是有些外国研究汉语的人能较多地摆脱印欧语法的羁绊，注意到汉语的特点，诸如高本汉、太田辰夫等之于古代汉语，龙果夫之于现代汉语”^①。

总括其特点是，他对汉语的语法现象观察细微，特别能在中国语法学者习焉不察之处发现规律性的东西。比如中国人常说：“那个地方很大”、“这个人很老实”等，他发现其中的“很”并没有实在的词汇意义，译成外文时是不必甚至不能译成“very”等词的。因为它只有语音—语法作用，并不表示比“大”更大，比“老实”更老实。进而他认为，汉语的副词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加于整个句子的，一类是直接属于谓语的。

龙果夫的这种特点在他为王力教授的《汉语语法纲要》俄译本(1954年)所作的序和详细的注释中已有所显示，更为集中的体现则在他的代表著作《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据胡双宝回忆，已故的朱德熙教授当年在看过这两本著作之后，也很赞赏龙果夫的这一特点。

后来，他的夫人龙果娃(Ekaterina Dragunova, 1901 ~ 1964)教授还以他的理论为指导思想主编了一本《汉语教科书》，在莫斯科大学长期使用，为提高该校的汉语教学质量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龙果娃在莫斯科大学从事汉语教学近二十年，她和龙果夫是列宁格勒大学的同学，后来不仅在生活上结成伴侣，而且在学术研究上也是很好的伙伴。

30年代中苏关系曾中断10年，汉学家无法来华从事学术交流，只好到靠近中苏边境、有东干族(回族)聚居的地方去作田野调查，搜集方言资料。龙果夫很重视从现实口语中采取资料以研究语言的传统，时常要去那里讲汉语的人群中调查，而每次龙果

^① 胡双宝：《汉语·汉字·汉文化》，第346页。

娃都要一同前往,并且一起写作论文。她对汉语音节的结构尤有研究,采用西方音位学理论为指导来描述注音字母体系,著有《汉语民族语言的音节结构》等文。

可惜龙果夫英年早逝,在1955年当他55岁时就去世了,但他的学术影响是长远的。2000年2月21日是他的百岁冥诞纪念日,彼得堡大学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学术纪念会议,我们在此也对这一位卓越的汉学家表示诚挚的怀念。

三、鄂山荫与《汉俄大辞典》

汉学家鄂山荫(I. Oshanin, 1900~1982)于1900年5月5日(俄历4月22日)出生在雅罗斯拉夫一法学家家庭,1924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随即来华工作,曾于1924~1926年、1933~1939年两度在苏联的驻华外事机构任职,先后任商务代办处职员和大使馆中文秘书,居留中国近十年,1942~1955年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学院、军事外语学院、外交部高等外交学校任教。

职业的变化虽然多,但鄂山荫对汉字的研究兴趣始终不渝,而且丰富的实践经验又促进了他的研究,所以在1944年即以论文《现代中国象形文字的发生、发展和结构》获副博士学位。他还发表有《论汉语动词的概念范畴》(1945年)、《论汉语词类》(1946年)、《汉语语法的几个问题》(1957年)等文章,并且编写了《汉语口语教科书》(1935年)、《一年级汉语教科书》(1944年)和《汉语教科书》(1946年)等著作。他1947年获语文学博士学位的学位论文也是以汉语研究为题的,即《汉语的单词和词类研究(汉语史分期试论)》(433页)。

不过,他关注的中心始终是如何让俄国人更便于掌握汉语的字词,其目标是编纂出汉俄字典。从1956年起,鄂山荫调任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字典部主任,而日后编出的《华俄辞典》便成了

他研究事业的顶峰,也是他的代表作和毕生劳作的结晶。

鄂山荫编成的辞典前后共出了4版。第一版出版于1952年,收词6.5万条,共891页,书名为《华俄辞典》;第二版成书于1955年,收词增至7万条,但篇幅仅增为900页;到了1959年出第三版时,篇幅已增至1101页。其间在1957年还曾出过一种袖珍本《华俄简明辞典》,收词约1.7万条;至于第四版的问世已是在他身后的1984年。鄂山荫在1982年9月5日去世,辞典则由后人接着完成。该版的篇幅已大为扩展,成为四卷,于1983年至1984年出全,所收词语剧增至25万条,四卷的篇幅共计在3600页以上,书名也改为《华俄大辞典》。

这是俄国正式出版传世的惟一一部大型汉俄辞典,更是鄂山荫博士学术上的一座丰碑。如果从1945年鄂山荫开始准备工作算起,经过几种版本的逐渐演进,到1984年四卷本最终完善,则前后历时近四十年。

这本辞典采用的“检字法”极为别致:曰“从右下脚的笔形算起”。对方块字来说,“右下脚”往往是汉字的最后一画,因此姑且称之为“部尾检字法”,同中国人习用的“部首检字法”相比,恰好是反其道而行之!辞典即按方块字的右下脚的笔画字形归成5类,每类之内再分成若干组。整部字典的快速检字表便成了5类、24组了,查起来倒也快速方便。

这种“部尾检字法”是俄国人用惯了的方法,已有悠久的历史,由第一代汉学家瓦西里耶夫于19世纪首创,传到20世纪初的罗森堡为第二代,再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第三代的郭质生,代代相传,凡编纂汉俄字典的人,都使用这种方法。不过,前面三代编过的汉俄字典都不曾长期流传,有的甚至只是手稿而未及出版,惟有鄂山荫编成的字典,才使这种方法定型和流传下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也是鄂氏的新贡献。

20 世纪第一年诞生的这三位俄国汉学家,各具特长,各有造诣,一个在语言研究,一个在文学翻译,另一个于工具书的编纂,他们似乎又是有所分工,又互相配合、互相协作,共同为推进俄国汉学的进展贡献出巨大的力量。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俄语系)